

誰是皇帝的最佳繼承人

許媛婷

《帝學》所反映的乾隆皇帝立儲觀

北宋范祖禹所編《帝學》，是一部專為宋哲宗講授歷代及當朝君主篤學求師的歷史教科書。這樣一部皇家講讀教材，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手中，他在認真閱讀之餘，一方面下令四庫館臣將其編入《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及《欽定四庫全書》之中；另一方面又讓六位阿哥親筆繕寫《帝學》，並且和詩，進而裝幀保存。此舉乃是期望有皇位繼承機會的阿哥們，能夠以史為鑑，學習古代明君聖主的美好德行。本院適典藏乾隆皇帝三位皇子及一位皇孫繕寫的《帝學》，其內容及裝幀形式一致，其背後成因為何，以往未見深入研究。本文嘗試追索當年乾隆皇帝下令皇子們繕寫《帝學》的時空背景，並看出他對未來皇位繼承人的期許與用心。



以史為鑑的聖君寶典——《帝學》

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八月，身為皇帝老師的范祖禹（一〇四一～一〇九八）趁著經筵講學之際進呈給宋哲宗（一〇七七～一一〇〇，一〇八六～一一〇〇

在位）一部《帝學》。（圖一）這部《帝學》

是范祖禹採集歷史上共三十二位君主的務學故事，依照時代先後，分成八卷編次，其肇始自上古時期的伏羲氏、神農氏等三皇五帝之聖君，下迄宋太祖到神宗等當代

帝王。進呈目的主要是希望宋哲宗以歷代

賢德之君正心修身、進學修業事蹟為學習榜樣，深切了解學古有獲的道理，進而成為一位明君。然而，范祖禹究竟是在何種淵源下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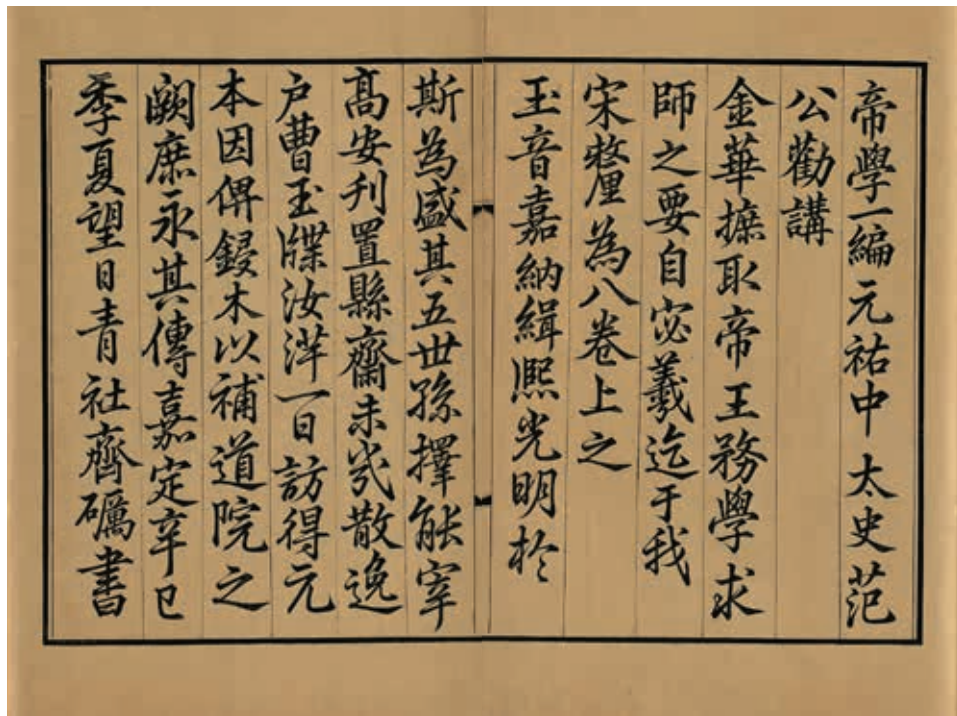


圖1 《帝學》清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元祐5年（1090）帝師范祖禹將所編《帝學》進呈給宋哲宗。本書為清初省園覆宋刊本，卷前有南宋嘉定辛巳（14年，1221）齊彞重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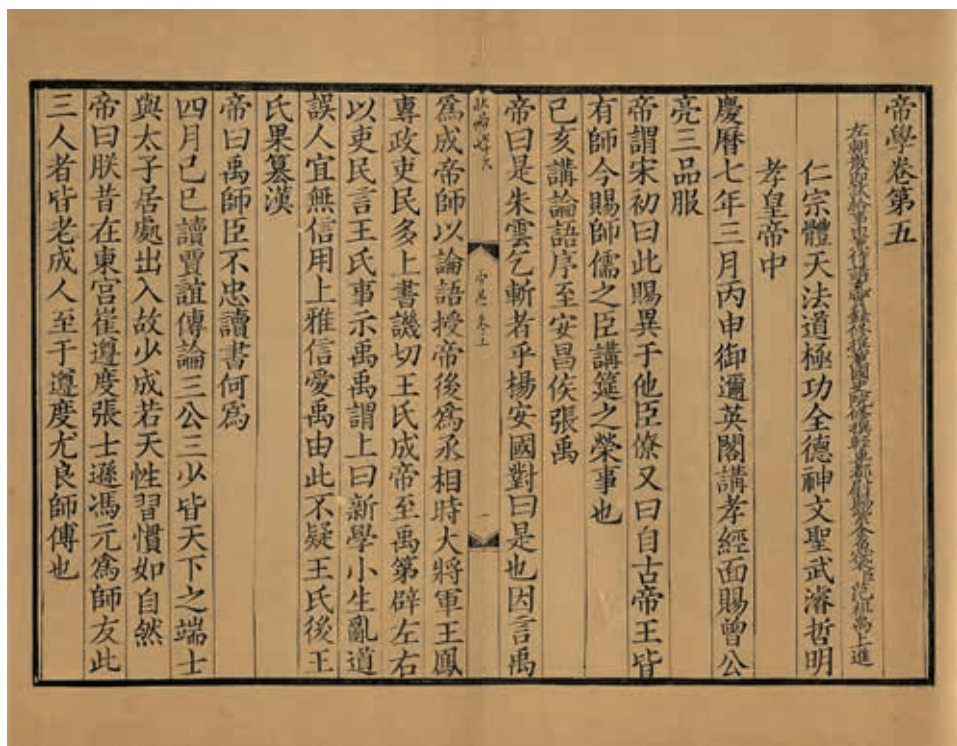


圖2 《帝學》清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學》卷5講述宋仁宗時建立經筵制度，讓儒臣至邇英閣、崇政殿講述《孝經》、《論語》內容。

生進呈《帝學》的念頭，以及為何著手編寫這部書呢？探其根源，便要從范祖禹的求學與從政生涯講起。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根據《宋史》記載，范祖禹的取名，居然與母親在生下他之前所作的一個夢有關。范母在生產前夕，曾於夢中看見一位披著金甲的雄偉男子，進入寢室，對著她說道：「我是漢朝將軍鄧禹。」等到范母醒來之後，夢中景象栩栩如生，如現眼前，於是將生下來的小孩取名為祖禹，字夢得。（註一）

祖禹幼年喪父，由其叔祖范鎮（一〇〇八—一〇八九）撫養長大。范鎮，字景仁，官至翰林學士，累封蜀郡公，贈金紫光祿大夫，年八十一而逝，諡號忠文。范祖禹自幼受到叔祖范鎮好讀經史，為人篤於行義、忠直勸諫的影響，在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進士甲科及第之後，便跟隨著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編修《資治通鑑》及《續資治通鑑長編》，並且負責編修《唐長編》，因而對唐朝歷史博識多通，為日後撰述《唐鑑》奠定良好的根基。其後，又在司馬光推薦下，擔任秘書省正字的職務。期間，范祖禹不斷

整理及撰述，編寫出《唐鑑》十二卷，並於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二月進呈給剛剛登基的宋哲宗，當時宋哲宗才十歲。事實上，范祖禹此舉應該是進呈給背後真正掌有執政實權的高太后看的。他以唐代政事為借鏡，希望藉重唐史經驗提供「為君之道」給高太后及哲宗參考，期能舉用賢人、肅正朝綱，達到政治清明、國治民安的最終目的。

哲宗登基之初，在高太后主導下，舉薦司馬光擔任宰相。由於范祖禹長時間追隨司馬光，因此得以擔任哲宗皇帝的侍講學士，這也使得范祖禹在元年進呈《唐鑑》之後，於五年又再度進呈了一部《帝學》。這部《帝學》有別於《唐鑑》之處，主要係在列舉歷代君主務學正心、篤仁好學的史實，全書甚至用了四分之三的卷數，大量敘述自宋建國以來太祖、太宗的歷朝君主利用政暇之餘閉門讀書，以及詔令臣子陪侍講讀經書；到了仁宗，更開始建立起經筵制度，讓儒臣至邇英閣、崇政殿講讀經史、解釋經義，或講述《孝經》、《論語》之學。（註二）（圖二）范祖禹深切地期盼著，希望哲宗能夠透過閱讀《帝學》，

以史為鑑，效法祖宗的勤學作風，並學習如何成爲一個聖主明君。

身為少年皇帝的哲宗，或許在高太后在世期間只能聽命順從；然而，待元祐八年（一〇九三）高太后崩逝之後，哲宗親政。隔年遂另立紹聖年號（一〇九四—一〇九七），一改原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政風，重新任用新黨的改革派人士，貶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范祖禹等舊黨人士。自此之後，隨著范祖禹政治生涯的浮沈之故，這部皇家教科書《帝學》除了曾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三）為朝散大夫試禮部尚書謝克家（？—一一三四）上呈劄子推薦，以及宋寧宗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二）被重新刊印之外（註三），至明代以後則罕見被提及。

阿哥們繕寫《帝學》的年月

時光荏苒，到了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的重陽節前一日時，乾隆皇帝在昭仁殿翻閱宋版《帝學》時，頗有所感在扉葉上題寫了一段題識。內容是這樣的：

此宋學士范祖禹編輯，進上乙覽元本也。成於元祐戊辰，重刊於嘉定辛巳。藏於御府有年，每於幾餘展閱，不特芬流楮墨，足備石渠東觀之遺。而自竅義迄宋，

凡帝王務學求師之要，燦然眉列，實為千秋金鑑。董子有言：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因題卷首，以志自勵云。乾隆甲子重九前一日。（註四）（圖三）

事實上，題識中有二處地方，可以得知乾隆皇帝應該是誤會了。首先，藏於御府的宋版《帝學》，並非范祖禹元祐年間進呈給宋哲宗御覽之祖本，應為南宋嘉定辛



圖5 《欽定四庫全書·帝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庫館臣著錄乾隆41年9月接到諭旨「皇子等所和詩著並錄。欽此。」，後錄六位皇子詩作。

各自和詩一首。至於阿哥們繕寫及和詩《帝學》的時間為何，又為何奉命繕寫呢？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皇四子永瑔（一七三九～一七七七）、皇六子永瑢（一七四三～一七九〇）及皇十一子永理（一七五二～一八二三）繕寫的三部《帝學》鈔本，除了阿哥們的名字及筆跡不同之外，可以看到每部鈔本的格式及內容全然相同。首先，阿哥會先恭錄乾隆皇帝分別作於九年的題識及四十年的題詩，詩末署下「乙未新正」；次為阿哥自己的和詩，然詩末並未署下年月。換言之，經考察實物之後，得知除了乾隆皇帝明確的題詩時間外，阿哥們真正的和詩時間並沒有記錄，唯可肯定應在四十年正月之後。

然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有幾位阿哥參與此次繕寫《帝學》及和詩的活動呢？其繕寫時間為何？背後契機又是如何？為了解開這些謎題，筆者試圖從《欽定四庫全書》館臣們所奉皇帝諭旨加以抽絲剝繭，尋求答案。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九月，四庫館臣將六位皇子的和詩鈔錄在《帝學》書前，並且著錄：「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奉旨：皇子等所和詩著並錄。欽此。」

展開，尚能感受其楮墨流芳之餘韻，所以他才會說出：「足備石渠東觀之遺」的話。到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正月，乾隆皇帝重新翻閱范祖禹的宋版《帝學》

時，不僅同意將其收入《欽定天祿琳琅書目》，還留下詩作〈題宋版范祖禹帝學〉：元祐成書心力殫，逮乎嘉定又重刊。欣茲祖禹芸編在，不異九齡金鑑看。務學求師著儀軌，修身莅政示倪端。

知之行矣吾猶惡，綈几寧惟玩古觀。
乙未新正再題。（註五）（圖四）
特別的是，乾隆皇帝除了自己題詩之外，還要求阿哥們須繕寫《帝學》一遍，並且

已（十四）年的重刊本；其次，元祐戊辰（三，一〇八八）年是錯誤的，正確時間應該是庚午（五，一〇九〇）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部宋版《帝學》必然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讓乾隆皇帝政暇之餘

因而下證據。這六位皇子除了前述的永瑔、永瑢與永理之外，尚有皇八子永璇（一七四六～一八三二）、皇十二子永璣（一七五二～一七七六），以及皇十五子永琰（一七六〇～一八二〇）。然而，是否僅有此六位阿哥奉命繕寫呢？這個疑惑在皇四子永瑔詩中得到答案，根據詩中小註云：「奉命子臣永瑛等六人各繕一部」，比對和詩結果，除了當時年僅十歲的皇十七子永璘（一七六六～一八二〇）外，恰好正是永瑔等六位較年長的阿哥。（圖五）

那麼究竟阿哥們何時奉旨繕寫《帝學》呢？根據現有的檔案資料，僅能從皇十五子永琰在阿哥時期所作詩作中得到一點蛛絲馬跡。由嘉慶皇帝帝師朱珪（一七三一～一八〇六）所編《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二〈恭和御製題范祖禹帝學元韻〉一詩，雖然將其編為癸巳（三十八，一七七三）年所作，然因永琰此詩即為配合當年乾隆皇帝於乙未（四十）年詩作的應和之詩，同時亦是鈔入《帝學》鈔本的詩作，所以可以確定是作於乙未年。（圖六）其後，該書卷五丁酉（四十二，一七七七）年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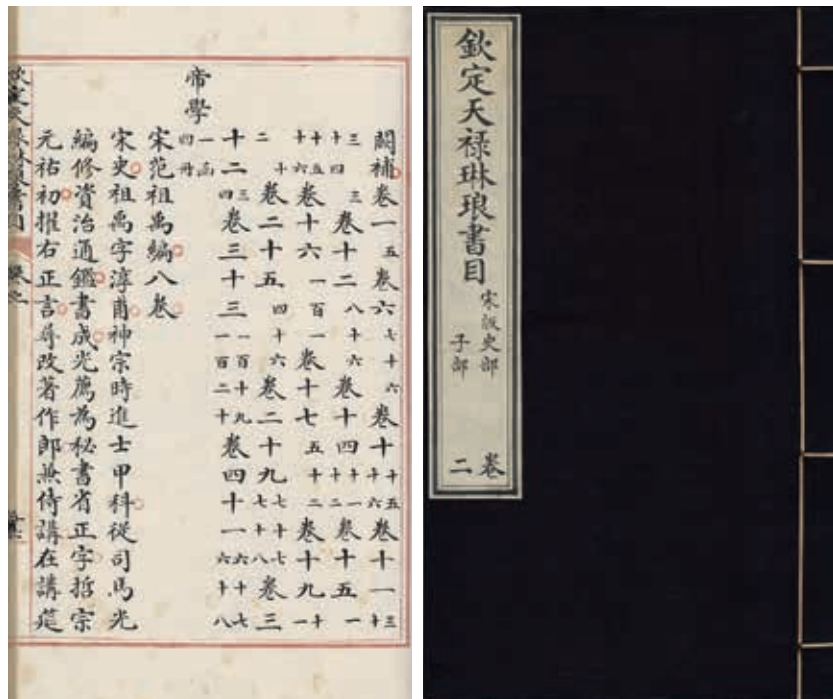


圖3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2〈宋版史部〉收入南宋嘉定辛巳（14，1221）年刊行之《帝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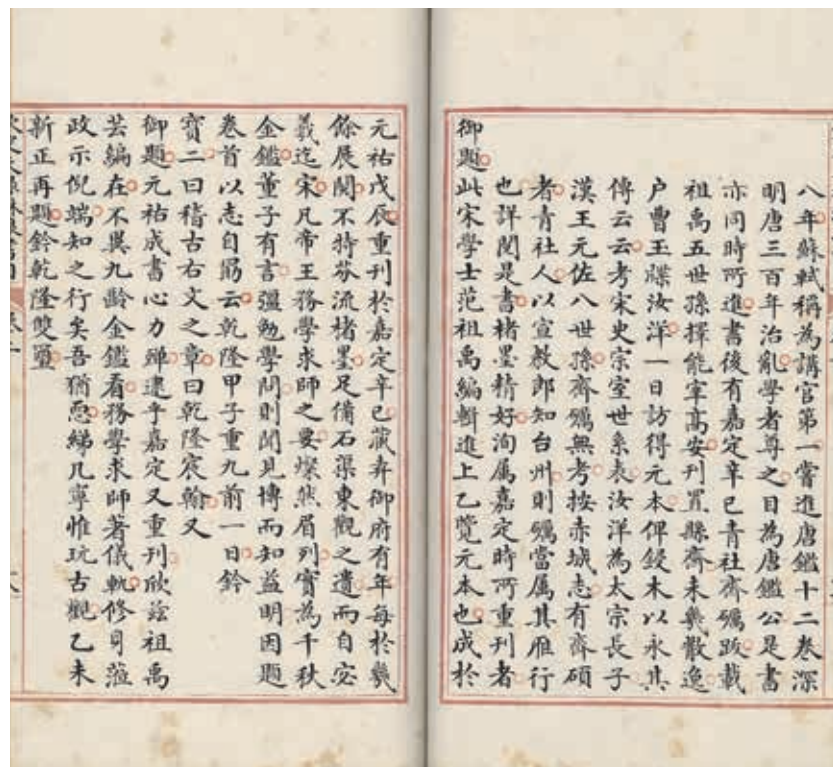


圖4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著錄乾隆皇帝分別於9年重九前一日題識，以及40年正月的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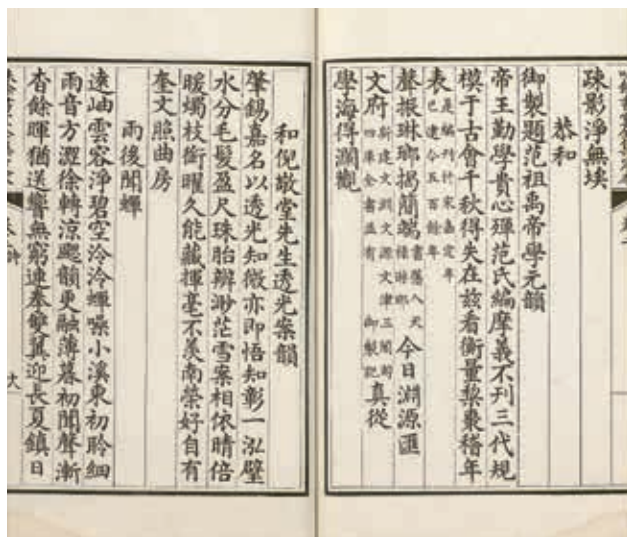


圖6 《恭和御製題范祖禹帝學元韻》《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2 清嘉慶5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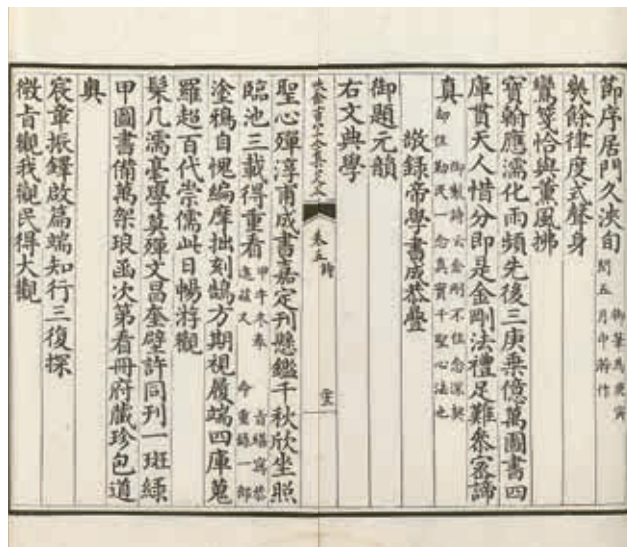


圖7 《敬錄帝學書成恭疊御題元韻》《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5 清嘉慶5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敬錄帝學書成恭疊御題元韻》，其中前四句詩與詩下小註云：「古典學聖心彈，淳甫成書嘉定刊。懸鑑千秋欣坐照，臨池三載得重看。甲午冬奉旨繕寫恭進，茲又命重錄一部」（註八）（圖七）若該詩中所記時間無誤，意味著早在甲午（三十九，一七七四）年冬，乾隆皇帝已經下旨命六位阿哥繕寫《帝學》；到了乙未（四十）年正月，乾隆皇帝題詩，之後阿哥們又奉旨和詩，並將詩

母鞫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註八）然由於是秘密立儲，除了乾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誰將是未來接位的幸運兒。因此，諸多猜測及揣摩上意等種種作為便持續展開，不斷地在暗中被運作著。

一件甚少為人提及與建儲相關的案子，即是發生在四十一年七月。七月十七日舒赫德上奏指出：查得山西候選吏員嚴譜家中寓所，有一張呈啓給四阿哥的紙及奏摺若干，其文辭狂誕不法，殊堪駭異。相關文件經乾隆皇帝閱過後，大為光火，隨即下旨徹查。據諭旨指出：該逆犯請議立正宮、論述宮闈內情，荒唐悖逆。其呈給四阿哥啓帖一紙，尤為可異。乾隆皇帝說道：「四阿哥現在諸皇子中，雖屬居長；若以辦事而論，六阿哥所管事務較多，何以轉欲向四阿哥投啓，殊不可解。」經皇帝詢問過四阿哥後，阿哥不以為意，反而欲暗為消弭此事。這使乾隆皇帝更為生氣，並指示負責承辦此事的舒赫德、阿桂、英廉等人絕不可迴護掩飾。乾隆皇帝盛怒下，甚至說出「豈有轉畏阿哥，而不畏朕之理！」（註九）

此事不斷延燒，舒赫德、阿桂、英廉

作補錄於已經繕寫完成的《帝學》鈔本之中。

不過，啓人疑竇的是，筆者在另外翻閱《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帝學》，則是十分驚訝於書中並無鈔錄這六位皇子的和詩，而館臣提要的署校時間為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換句話說，六位皇子於繕寫《帝學》之後，直到同年十二月之前，四庫館臣們都沒有接到皇帝下旨要將皇子和詩鈔

等人隔日立馬奉旨查辦，其間所查任何事證即以五百里飛遞送達宮中。乾隆皇帝則分別於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特下諭旨，指示將逆犯嚴譜交九卿嚴審，並處以凌遲之罪。從事件發生、訪察、審訊，到處決結束，時間不到一週。這究竟是因為乾隆皇帝的處事明快，還是代表皇帝非常嚴肅看待此一事件。

顯然兩者兼有！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四庫館臣會在當年九月接到乾隆皇帝諭旨，須將六位阿哥所作《帝學》和詩鈔錄於《欽定四庫全書》之中。由於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嚴譜事件發生時，當時乾隆皇帝與阿哥們還在熱河避暑山莊秋圍駐蹕。（註十）待九月初回到宮中後，乾隆皇帝便下了這道諭旨。雖然目前尚未找得嚴譜事件與六位阿哥和詩被鈔入《欽定四庫全書》的直接證據，然從事件發生時間如此接近的情況看來，實不能排除兩者間的密切關連。

六位皇子的《帝學》和詩

乾隆四十年，六位阿哥們奉旨寫下和詩之後，隔年九月將詩作交四庫館臣繕錄。

入《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帝學》之中；一直到隔年（四十一）九月，皇帝才下此道諭旨，命館臣將其九年所寫題識及四十年所作御製詩，以及「皇子等所和詩著並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帝學》之中。這著實讓人好奇，究竟四十一年政壇上是否出現什麼狀況，致使乾隆皇帝下了此道諭旨？

乾隆四十一年嚴譜事件

事實上，乾隆皇帝命令阿哥們繕寫《帝學》，顯與日後「皇位繼承人」這個因素脫離不了關係。根據清史學者們考證，乾隆皇帝秘密建儲的時間表，事後曾公開宣示他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密立皇太子永璉（一七三〇～一七三八），以及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密立皇十五子永琰這兩個時間點。（註七）事實上，乾隆皇帝在三十八年密立儲君之後，心中仍是充滿不安，所以他後來在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九月初九日公開宣示早在三十八年冬南郊大祀時，曾以秘定儲君之名對上天默禱：「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吳蒼眷佑，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

透過詩中意境，我們除了可以看出阿哥們寫詩心境大不相同之外，又據院藏《帝學》實物考察，因此還發現其中一位阿哥的「一字之改」。

按阿哥長幼先後，首為皇四子永璉的詩作。此詩可說是諸皇子詩作之中，最為恭敬戒慎的一首。

儒臣第一妙研理（謹案本傳，蘇軾稱祖馬為講官第一），仰契皇心論不刊。古鑑炯如著蔡奉，陳編珍越鼎彝看。數千年上窺精蘊，三萬言中得肇端。（帝學共八卷，計二萬九千餘字）幸荷綸音勸染翰（奉命子臣永璉等八人各繕一部），豹斑粗識愧童觀。（圖八）

詩中首聯前二句語帶雙關，雖表面係言北宋儒臣范祖禹竭盡心力將《帝學》所示的「不刊之論」（正確且不被磨滅之精闢言論）進呈給哲宗，以示忠誠；然而皇四子永璉亦有以儒臣暗喻自己，仰望皇上（父親乾隆皇帝）之心的示誠意味。其後的頌聯及頸聯，主要讚譽《帝學》內容明亮彰顯，如同占卜所用的蓍草與大龜般，足可奉為圭臬；而此部古籍所教導的道理，較之古代祭器上所刻示內容更為珍貴。尤其



圖9 皇六子永瑤《帝學》寫本，其詩文辭俊雅，用典最佳，堪為六篇詩作之上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乾隆40年皇四子永城《帝學》寫本，為諸皇子詩作之中，最為恭敬戒慎的一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書中近三萬言的文字，可一窺數千年來所蘊藏的古人智慧精華。末聯謙言幸而皇帝下諭命皇子們繕寫，才讓自己淺薄的視野得以窺豹一斑，粗淺識得《帝學》的

重要性。從皇四子永城詩中，可以感覺他欲藉此詩向乾隆皇帝釋出的忠誠意圖有二：其一為宣示其身為子臣，仰望皇帝之心，不

敢踰越；其二繕寫《帝學》並非出於本意，乃因皇帝下諭旨而為之，同時不止他一人，共有皇子六人繕寫，以此暗示他絕無以皇位繼承人自居的念頭。

而皇六子永瑤之詩作，文辭俊雅，用典最佳，堪為六篇詩作之上等。然即使有如此詩才，但他於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已出繼為慎郡王允禧（一七一〇—一七五八）孫，故而今日清史學者在推測乾隆皇帝建儲人選時，常將其排除在外。其詩作如下：兩閭（邇英、延義）陳言要義殫，先經繕進後經刊。（建文中，禮部尚書謝克家上言請勅祖禹之子宗正少卿沖績本進覽。嗣祖禹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嘉定中戶曹趙汝補刊）講筵不愧眉山譽（謹案本傳，蘇軾稱祖禹為講官第一），史筆應齊涑水看（祖禹進《唐鑑》十二卷，學者有唐鑑公之目）。紙墨古香留篋裏，星雲宸藻冠篇端。執中聖學同堯舜，一善兼資備監觀。（圖九）

至於其他阿哥的诗作，則顯得通達順理，但力求表現。各詩列敘如下：皇八子永璇：「聖學勤師古訓殫，嘉謨有契論寧刊。惟精惟一傳心接，求治求安運掌看。用極光由慎乎德，從長猶念執其端。曲江金鑑

編堪續，宵旰堯衷比例觀。」；皇十一子永瑄：「太史編書典制殫，衢州投進溯重刊。如斯方冊真資用，合是嚴廊不厭看。祭海三王皆後委，傳薪千古必求端。孤摛銜感應何極，今日常蒙聖主觀。」；皇十二子永璉：「臣心克輔主心殫，七百年來義不刊。治要垂為邦國守，幾餘宣示子孫看。校書葉掃循庭際，給札膏焚謹席端。天藻輝煌標學鏡，親賢念典仰臨觀。」；以及皇十五子永琰：「帝王勤學貴心殫，范氏編摩義不刊。三代規模於古會，千秋得失在茲看。衡量梨棗稽年表，聲振琳琅揭簡端。今日淵源澤文府，真從學海得瀾觀。」

若將六位阿哥的詩作羅列比較，除了皇四子永城詩作別有他意之外，其他不管是皇六子永瑤、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瑄、皇十二子永璉，還是最終真正的繼承人皇十五子永琰，從其詩句中可看出眾阿哥們文辭務典，只不過在偏重《帝學》書中執守聖學、以史為鑑的治國意涵之餘，亦各自以不同的嵌入式語法向父皇示好，其力求表現之心，昭然可見。像是皇十一子永瑄「今日常蒙聖主觀」，聖主即指乾隆皇帝，特別的是，《欽定四庫全書》著



圖11 清嘉慶9年正月綿寧《帝學》寫本，除了恭錄皇祖乾隆皇帝的題識及詩之外，亦謄錄皇父嘉慶皇帝〈昧餘書室恭和詩〉。紫檀木盒及函套裝幀係仿乾隆朝《帝學》做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謄錄皇祖乾隆皇帝的御識、御題之外，並恭錄父親嘉慶皇帝的和詩，再加上綿寧自己的一首和詩。根據道光皇帝在登基前的詩作集《養正書屋全集定本》卷四〈恭和御製題范祖禹帝學元韻〉，推知其詩作當作於嘉慶九年（一八〇四）正月之際。（註十二）可以得知該部乃是嘉慶皇帝即位後才下令未來皇位繼承人綿寧繕寫而成，與其他部《帝學》繕寫時間不同。（圖十一）

至於院藏皇四子永瑛、皇六子永瑨及皇十一子永理分別繕寫的《帝學》，從其內外繕寫雅緻、裝幀精美，以及形式一致看來，顯然係同一段時間完成製作。然而，這幾部《帝學》究為何時製作完成？筆者為此查找《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的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一年這兩年期間《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有作坊記錄，然逐一翻閱後，僅發現在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熱河隨圍〉有《帝學》製作記載：

初十日，太監常寧傳旨：照春好軒現設紫檀木雕紋錦邊硯盒，做得雕迴紋邊紫檀木書套匣樣一件，並請蓋上嵌玉扁（按：扁字應為鑲字）嵌一塊配一部。欽此。於十月二十七日寫，照春好軒硯盒樣，做得迴紋邊紫檀木書套匣樣一件，

錄作「常」字，卻在其繕寫的《帝學》鈔本中，被剝改成為「猶」字。（圖十）今日雖然無文獻資料可追溯此「一字之改」

究為乾隆皇帝所下旨意，還是永理阿哥自己要求修改的，但修改時間肯定不會早於四十一年九月。至於皇十二子永璿「臣心



圖10 皇十一子永理《帝學》寫本，錄於《欽定四庫全書》詩中「今日常榮聖主親」，在繕寫本裏被改成今日「猶蒙聖主親」。（最末一行下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克輔主心擘」相對應「給札膏焚謹席端」兩句，同樣也可以感受到其身為子臣繕寫《帝學》係奉皇命所為，不敢踰越的君臣份際。至於皇十五子永琰，則是將父皇得意的《欽定四庫全書》文化大業化為讚辭「今日淵源滙文府，真從學海得淵觀。」由此可知，六位阿哥們對於奉命應和御製詩，其謹慎與重視的程度，顯然非同小可。

院藏《帝學》的裝幀風格

院藏由皇室成員繕寫的《帝學》，共有四部，其中三部為乾隆皇帝的皇子們繕寫，分別為皇四子永瑛、皇六子永瑨及皇十一子永理；另外一部為嘉慶皇帝的次子綿寧阿哥（即日後的道光皇帝，一七八二—一八五〇）繕寫的《帝學》。

此四部《帝學》雖裝幀風格一致，然其中由綿寧繕寫的這部，首先依時間推算，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時，綿寧尚未出生；再者，此部雖可看出模仿痕跡，然不僅在尺寸上略小於其他三部，且不論是木匣的外觀、裝幀、材質，還是嵌玉位置，均與其他三部明顯不同；另外從鈔本卷前



圖12 嵌玉紫檀木盒蓋內雕有單龍戲珠，中間刻字填金「子孫永保」字樣，底座有迴紋邊雕樣，係依照宮中已成做之硯盒蓋形式製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呈覽。奉旨：向裡邊查玉嵌安。欽此。於本日，太監如意交白玉象扇（按：鑲）嵌安。欽此。（註十二）

不過，除了此條項下明確提到《帝學》兩字之外，其餘關於鈔本及紫檀木盒製作之相關訊息，則付之闕如，實令人費解。根據上述記錄，皇子們繕寫《帝學》所搭配的嵌玉紫檀木盒，係根據避暑山莊萬樹園東南的「春好軒」陳設之紫檀木雕紋錦邊硯盒形式而作，而盒蓋嵌有白玉飾樣，經

比對院藏幾部《帝學》紫檀木外盒後，其蓋上確有嵌玉。

此外，該嵌玉紫檀木盒蓋內另雕有單龍戲珠，中間刻字填金「子孫永保」字樣，極有可能是依照宮中早已成做好的硯盒蓋形式，再依樣製作而成。此點可根據乾隆四十年十月《廣木作》：「初四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刻字填金紫檀木硯盒蓋一件（寧壽宮）；嵌玉刻字填金紫檀木盒蓋一件（盒裏上雕一龍戲珠，延春閣）。傳旨：將寧壽宮硯盒蓋照延春閣

硯盒蓋雕龍一樣，畫樣呈覽。欽此。」（註十三）其後，四十一年十一月《廣木作》又有類似記載：「二十九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來說太監如意交詩意長方硯一方（懋勤殿刻得字）；紫檀木長方匣一件，內盛漢玉雙魚佩一件、漢玉娃娃二件、冊頁一冊；嵌玉刻字填金紫檀木盒蓋一件（盒裏雕單龍戲珠）。傳旨：將詩意硯照長方匣外面樣式，裡面照盒蓋單龍戲珠樣配做盒樣呈覽。欽此。」十二月初一日將做好樣式呈給乾隆皇帝覽閱，得到的指示是「奉旨：照樣准做。其蓋上查玉嵌安做樣。長方匣並盒蓋交原處。欽此。」（註十四）由此可知，寧壽宮硯盒蓋內雕單龍戲珠形式，乃仿自建福宮花園內的延春閣硯盒蓋而來。顯然盒蓋內所雕的單龍戲珠，以及刻字填金字樣，係出自宮中常用於盛裝墨硯，或者玉器等物之裝飾紋樣。院藏幾部由皇子們繕寫的《帝學》，便是配裝著蓋內雕單龍戲珠及刻字填金字樣的紫檀木盒，其盒樣極可能同樣參考自「嵌玉刻字填金紫檀木盒蓋」而來。（圖十二）

結語

依照上述，六位皇子們繕寫《帝學》、和詩，以及嵌玉紫檀木盒的製作，均非同一時間完成。係早在乾隆三十九年冬繕寫，四十年和詩，而遲至四十一年九月才製作嵌玉紫檀木盒的。至於乾隆皇帝命令皇子繕寫《帝學》及和詩的原因，顯然與其對未來皇位繼承人的道德及品格要求有關。

自從乾隆皇帝於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著手修建歸政後處所「寧壽宮」（註十五），便開始考慮到未來的皇位繼承人事宜；到了三十八年冬南郊大祀，不但採取秘密建儲，並以所定皇子之名向上天默禱「以所定之子若賢」；直到六十年（一七九五）真正宣布隔年歸政，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正月初一日舉行傳位大典公告天下的《太上皇帝傳位詔書》所提：「皇太子秉性謙沖，臚誠固讓」以及「仁孝端醇，克肩重器」，皆不難看出乾隆皇帝下旨命阿哥繕寫《帝學》及和詩的期許與用意。此不僅是針對未來皇位繼承人所出的一道試題，更重要的是藉由此次過程讓繼承者學習如何做一個聖主明君，同時亦昭示著乾隆皇帝在德與才之間，仍然秉持著以德取人、

賢者在位的中心思想，而這種以德為重的用人思想日後更深遠地影響到嘉慶皇帝的施政理念，因而得以建立一個有為有守的

嘉慶時代。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參《元》脫脫，《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傳》：「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殿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臺北：鼎文書局，一九八四，頁一〇七九四。
2. 參申慧青、王瑞雷，《論范祖禹《帝學》與宋代的皇帝教育》，《保定學院學報》第二十五卷第三期，二〇一二年五月，頁六四一—六八。
3. 有關南宋嘉定十四年《帝學》的重刊本，清代藏書家及現今版本學界對此一版本的想法稍有歧異，或主張該本為刊本者，如《清》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收入《珍稀古籍書影叢刊》第四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二四三—二四八；或有主張該本為活字本者，如《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頁四〇二—四〇三。詳見熊克，《是清省國藏板，還是宋活字本——為繆藝風著錄宋活字本《帝學》及有關問題辨證》，《四川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〇年第一期，頁六九—七五。
4. 參《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二，《宋版史部》，清乾隆間內府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 同前註。
6. 參故宮博物院編，《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御製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
7. 有關清代皇帝建儲經過的相關論文甚多，此處僅列與乾隆皇帝立儲事宜較為相關者，如張玉芬，《乾隆建儲始末》，《遼寧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七七一—八二；朱誠如，《乾隆建儲與訓
8. 參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九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二九九—三〇〇。
9. 參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上諭，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八冊，頁三三九—三四一。
10. 據「軍機處奏摺錄副」，臣于敏中謹奏：「本年八月，阿哥隨駕木蘭行圍，所有上書房師傅謹擬阿肅、周煌、達椿、吳綬詔、倪承寬隨往，為此謹奏。奉旨：知道了。欽此。」收入于紅霞編，《清宮熱河檔案》第四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二〇〇三，頁五—六；另外，又有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三日：「臣于敏中謹奏，本月初三奉旨：阿哥於明日下午，即行啓程回京。欽此。所有書房輪派隨來之阿肅、周煌、達椿、吳綬詔、倪承寬及清書諸達德爾恭應隨阿哥回京。理合奏聞，謹奏。」，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八冊，頁三九二。
11. 見故宮博物院編，《養正書屋全集定本》，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御製文集》，頁四二七。
12. 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九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一月，頁六〇〇。
13. 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八冊，頁五一—八。
14. 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九冊，頁六九—八。
15. 參王子林，《乾隆太上皇宮寧壽宮營建考》，《故宮學刊》總第七輯，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頁二二—二四三。